

我为脱贫攻坚“留影”

一个记者在苗寨的蹲点笔记

本报记者黄孝邦

2017年11月5日，我第一次前往乌英。在手机地图上，你甚至找不到“乌英”的所在，只能搜索到“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尧坞村”。从南宁出发，汽车在G72泉南高速一路向北奔驰，4个小时后到达了融水县城。歇息一晚后，第二天一大早我便赶往杆洞乡。那时，县城到杆洞乡的公路，有一半正在修路，经常堵车。另外半程经过一个雨季的雨水冲刷后，很多路段坑坑洼洼。汽车有时沿着山路不断爬升，似乎要入了云端；有时又不断下坠，在谷底盘桓。沿路可见那连绵的山脉，葱翠茂密的树林，还有一个个散落的村寨，如一个个孤岛深藏在大山深处。140公里的路程，我驾车一路颠簸6个多小时，来到杆洞。11月7日一早，我又从杆洞乡出发，驾车25分钟，终于来到了我要拍摄的乌英苗寨，距离乡政府所在地13公里。

群山环抱，苍翠护卫，两条小溪从大山潺潺而下，汇合于寨子中央，又缓缓流出田地，再跌下山谷坠入壑里河。据当地人介绍，大的那条叫乌嘴，从贵州而来；小的那条叫乌英，从广西而来。两条溪流交汇于此，如同这里的居民，有的户籍属于贵州，有的户籍属于广西，却又百户同心。

桂黔交界，一直是苗、瑶、壮、侗等少数民族聚集的山区。乌英苗寨是这里最偏远的寨子之一，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世居人民都是苗族，清朝后期，为避战乱和匪患，先后有吴、梁、潘、卜、韦五姓先祖陆续迁入大山深处这个隐秘的皱褶里，开山拓土，繁衍生息。其中吴、梁、卜三姓从广西融水县尧坞村迁入，各称税赋由广西征收；而潘、韦两姓则分别从贵州荔波县和乌英对面20里外的南岑村而来，自然向贵州纳税，因而从100多年前开始，这个小小苗寨的居民户籍注定分属两个省（区），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如今，乌英苗寨143户居民中，102户属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尧坞村，41户属贵州省从江县翠里瑶族壮族乡南岑村。乌英苗寨最大的特点在于“一寨两省区，五姓为一家”，这里是中华民族民族融合的结晶，民族团结进步的典范。户籍虽分属两省（区），但在乌英人心里，却全无桂黔之分，所有田产、房屋全是“插花”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乌英从未发生失窃现象，大有“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之景。即便是到了乡里，沿街商贩晚上收摊，也只是把货物简单收拾，盖上布膜，留在大街摊位上，无须搬回屋内。邻里之间偶有纠纷，去芦笙堂的古枫下请长者当面说清楚就好了。

坐落在“一寨两省（区）”的山区腹地，使得乌英至今还保留着原始的风貌和贫困的烙印。因为交通的制约，杆洞乡的整体发展也是相对缓慢。而乌英苗寨的发展相对乡政府周边的几个村寨，经济发展落后5公里外的寨子至少10年。截至2016年，乌英苗寨的140多户家庭中，有92户是贫困户。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慢慢了解熟悉乌英：

寨子的环境比较脏乱差，群众生活依旧很贫困，贫困发生率超过60%；

受“狗不耕田，女不读书”传统观念及经济落后等因素影响，中年妇女们小时候都没有上过学，几乎不会讲普通话和桂柳话，很多人县城都没有到过；

乌英山多地少，群众赖以为生的是人均仅有的两三分梯田；

黔桂两省区联合党支部和跨省区教学点的运行模式很特殊，两省区共管的模式也特别；

人们对芦笙文化的热爱超乎想象；长期封闭和滞后发展导致乌英人在与外界的交流中，似乎缺乏一点点自信；这两年，合作社种过百香果，种过红薯，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效益。

……

乌英这些基础设施、文化、地理环境、生活方式、民俗、产业、党建等方面的特点，成为我们日后研究它如何实现脱贫致富进而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的基础。

那段时间，我在苗寨里积累了一些素材，也慢慢喜欢这里，决定将这里作为融水脱贫攻坚摄影报道的蹲点基地，“苗山脱贫影像志”这棵树就这样在大苗山开始种下了。每一项内容、每一个选题就是“苗山脱贫影像志”的一条枝干，每一张照片、每一个文字就是一片叶子，每一次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的瞬间，就是流淌在枝叶里的滋滋养分。

在祖国的西南，云贵高原苗岭山地向东延伸着，形成连片的石漠化片区，土地资源匮乏，自然环境恶劣。在桂黔交界的大山深处，有一座古朴而又美丽的苗寨，那就是我要讲述的乌英

在苗语中，“乌”意为美丽、漂亮，还有河水、山泉水的意思；“英”意为新娘子、新媳妇。乌英就是“美丽的新娘”

我在那里，用“解剖麻雀”式的“标本记录”苗寨正在发生的一切。仅2018年一年多的记录，“苗山脱贫影像志”已生根发芽，30多组500多张照片，如一条条枝干一片片叶子。“苗山脱贫影像志”的乌英苗寨不仅仅只是乌英，而是大苗山的乌英们。用“‘1+N’个苗寨=整个县城”的报道模式。“1”是突破口，首先选择了最偏远、最具代表性的贫困村寨乌英苗寨作为主拍摄地，在取得整组报道成功的基础上，再将报道范围扩大到“N”（多个）苗寨，扩展报道的深度和广度。剖析“1+N”个村寨，就等于剖析了一个县的脱贫攻坚历程，同时也管窥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伟大时代

苗家欢乐多

苗族人是多才多艺的，所以苗寨里的节日较多，农历十二月初一至次年二月初一属过年期。首先是苗年，年轻人吹芦笙走村串寨交朋友、打同年，活动一直延续到春节，接着过春节。每年农历腊月初六，四面八方的山民们便汇聚古枫下的芦笙堂，共吹一堂芦笙，笙歌载舞，通宵达旦，共庆新年。芦笙堂边挺立着四棵百年古枫，它们同根连体，枝繁叶茂，成为乌英一寨两省（区）团结和睦的象征。古枫被人们如金字塔般保护起来，既是祭祀先祖神灵的圣地，又是安放封存芦笙和村民协商议事、休闲纳凉之所。

二月中旬，择日过春社。节日当天，村民集结队伍，吹芦笙绕着村子走半圈，预示春耕即将来临，此节过后，吹奏芦笙和苗苗等娱乐活动已到禁止期，大家须共同遵守禁令。传说，很多年前，苗族先神看到大家沉迷于娱乐，不思农耕，便制定下这一规矩，让大家行乐有节，依时农耕。

在众多的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中，苗族的新禾节也许是唯一没有确定日期的节日，大概约在农历小

暑到大暑之间，以早稻成熟为标志。

在苗寨里，由于各村的水土、气候等自然环境条件不尽一致，因此，早稻的成熟时间也会不一样，往往会相差一天或几天，因此，每个苗寨的新禾节也会有先有后，不尽相同，但苗族人民对于庆祝新禾节的情感是一致的，都是表达人们对丰收的庆祝

和喜悦，隆重程度仅次于春节的传统节日。新禾节共7天，第一天清早，各家各户到田间取3根谷穗，打开苞壳包上来，叫“包粽子”，“粽子”包好后又放回田里去，插上草标，再回家过节。封存半年的芦笙，在这一天终于可以取出来了。

乌英芦笙号称苗族文化的活化石。乌英芦笙调多曲长，悠扬婉转，自成一格，每一曲似乎诉说一个深情动人的苗族故事。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不会吹芦笙的乌英人。他们吹芦笙可以从早吹到晚都不觉累，且吹奏节奏齐整，芦笙摆姿势整齐大方，属当地最具水平的芦笙团队之一。此外，苗歌也特别动听，尤以即兴编唱最为流行，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张口成歌。

我的手，又是摸又是焐。老人用苗语似乎在说：“年轻人，外面好冷，你看你的手好冰……”在感受到老人突如其来粗糙的大手时，我环顾火塘，昏暗的木屋里，十几双饱经风霜的手在红色的火光映照下散发着“灵光”。我被震撼了，心里顿时升腾起一个感受：“这些手不就是脱贫攻坚的最关键的力量吗？”于是，我决定把这些手放在产业脱贫的大背景下进行拍摄，通过手的肖像展现苗族群众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我拍摄了100多双手，这些手有的握着木工具刀，有的在搬运水泥，有的在栽种果苗，有的在建房时削掉了两个手指……一双手，就是一部人生奋斗史。对准每一双手，每一次按下快门，都是我对每一种人生表达的敬意。

田间地头的午餐

由于地处云贵高原东南部与广西盆地的过渡地带，石漠化问题严重，融水总面积4638平方公里，山地就占到了85%，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恶劣的自然条件导致农村交通基础设施严重落后。而乌英是其中更偏远、落后的地方。据村干部说，水泥路1978年就通到了乡里，却迟迟到了不了乌英。山上有木材，却迟迟到不了乌英。山上有木材，可销售也是个难事，他们还要扛着木头，翻过一座山，蹚过一条河，走4个小时的路到乡里去销售。运输成本太高了，比如一根木头50块钱，运出去的人工成本却要半头猪。

山多地少，乌英人赖以为生的是人均仅有的两三分梯田。他们主要的生计是种地，但产量少，不够吃。混着红薯、木薯的杂粮粥，是苗家人最常见的饮食。他们的田地零



▲黄孝邦在拍摄村民野外准备午餐。

覃天阳摄

牧童班的娘子军

在田间地头，在村口寨里，我时常见到乌英娘子军劳作的身影。青年男子外出务工去了，留守在家的乌英妇女们便顶了半边天，甚至更多。上山下田，抬石头，扛木材，修河堤，她们吃苦耐劳，不输男子；做亮布，酿酒，洗衣做饭，照顾老人孩子，她们温柔体贴，用爱温暖着家。

我和她们之间的交流，就是我会的十几个日常苗语。虽然我一直在努力学习苗语，但是要和乌英苗寨的妇女们能顺畅交流，还需时日。我也一直提倡并在不断去推动她们学习讲普通话，实际效果很不理想，如我去学习讲苗语一样。在乌英脱贫的路上，女性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首先要做的就是让她们识字，学好普通话。受经济条件、地域环境、传统婚姻习俗等诸多因素影响，20世纪80年代，全县女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在更早的年代，苗族女童上学读书的机会更少。因此，在乌英苗寨，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妇女，几乎都没有接受过教育，那时候，只有男孩子才可以读书，女孩子要带弟弟妹妹、放牛放羊、种田砍柴等等。如今，她们大多不识字不会讲普通话。日常生活中，她们大多叫“xx迷”，迷，苗语就是“阿妈”的意思，前面xx就是她们小孩的名字。

今年48岁的韦妹丽是亮布技艺的传承人。她跟我说：2016年，县里组织一批传承人到柳州市开展交流活动。从未出过远门的她接到电话通知后，一直不敢去。因为看不懂文字，也不会讲普通话，不知道如何去坐班车到县城，又如何坐车到柳州市。在柳州读书的女儿卜银花多次动员后，并说

好全程陪同，韦妹丽才答应。“我就是个盲人”，韦妹丽说她第一次看到高楼林立和车来车往，很恐惧。

67岁的梁英迷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村里面的妇女主任。她第一次到县城，是随队到县城学习。上课的时候，学员要按桌面上的名字来坐，因为看不懂名字，梁英迷随便找个位子坐下。后来，工作人员点名时才发现她坐错了座位。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时，梁英迷看着桌牌，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名字是这样写的。“这就是我的名字啊！”之前的尴尬瞬间被好奇和幸福取代。

梁英迷的女儿，44岁的梁足英说，小时候，她的小姐妹们个个都是牧童。她做梦都想读书，经常背着妹妹到教室外面偷偷听课。她们的读书梦做了三十多年。

见到陌生人来到寨子里，她们不敢说话，远远地躲开了。有时候，我在寨子里碰到她们，会有意用普通话跟她们打招呼——“你好”“你去哪里”“吃饭了吗”。感觉这样还不够，和驻村指导员一合计，我们决定办一个普通话学习班，想在晚上或者农闲时候把她们集中起来学习。刚开始，学习班进行得并不顺利。大家并不愿意来，家里的农活确实挺多的。妇女主任何玉清自己带头参加，还挨家挨户地上门动员。驻村指导员还想了办法，给按时上课的妇女发一些小奖品，洗发水、洗洁精、香皂之类。渐渐地，她们爱上了这个学习班，学得最多的一句就是：劳动最光荣，学习最快乐，欢迎你来乌英。

我希望有一天，她们会明白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意义，就像梁英迷第一次看到自己名字时的那种震撼。

就这样，两天时间，群众都按照广播上的倡议去做，140户，每家每户种了两三棵。67岁的老党员一个人种了50棵，还有核心团队的积极分子在村里的公共场所种了100多棵。这样算下来，整个寨子种了四五百棵。但这个时候，很多人并不太清楚为什么要去种这个野树，甚至还有人把我们种在公共场所的树苗砍断拔掉。联合党支部的支书说，他会去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可是一到广播就只有黄记者了。

几百棵树种完了，大家一看，这不行啊，并没有达到规模的效果。大伙一合计，要再次发动。于是又去广播，又是黄记者。每次听到这个广播，我都有点慌。

就这样，一直种一直种，我也是一边采访，一边帮忙种树。没有车子拉树苗，我开车去拉。这个地方种哪棵？大苗还是小苗？这棵树种哪里，问黄记者。我不会种树，种哪里，其实我也不知道，村民缺一颗主心骨了。我不在乌英的时候，没有人去种。

我就这样深入参与这个事情，慢慢地变成了每一棵树都是我的心血。那段时间，村民见面打招呼都是：你种了几棵？

寨子里能种的地方都种满了，进苗寨3公里长的公路，每隔不到两米，两边都种一棵。就这样一直种到4月底，竟然种了5000多棵树。也不是每天都种，因为到4月份，其实已经过了种树的季节，我们每天就研究天气预报，后面几天有雨的话就种。

当年的雨季以及后来的长时间干旱，这批树的存活率仅有30%左右。即使是这样，我觉得已经很好了。这件事，让乌英的村民团结一心，干成了一件，达成了共识，至少不会再有人砍我们种的树了。种树要有效果，必须是一件长期坚持的工作，每年都要坚持种。我深刻体会了发展产业之难、群众工作之难，脱贫攻坚工作，一定要按规律来办。

今年春天，我们又种了3000多棵李树。如果说，野树可以任其自然生长，那么李树种植之后的施肥、剪枝、除草、杀虫、浇水，每一个阶段的管护都非常重要，需要一个有凝聚力的团队才能管好。这个团队就是接下来

的“双语双向培训班”——牧童班的娘子军。

有树初长成